

常言道：“盛世收藏，乱世经商。”在文化名城曲阜，就有一家以收藏历代科举文物为主的民间博物馆——中国状元文化博物馆。它位于曲阜市明故城城墙内，收藏了历代的考卷、皇榜、圣旨、牌匾等珍贵文物1800多件，系统展示了古代莘莘学子的状元之梦和状元之路。

在该馆第一个展台陈列的是清同治七年(1868年)洪钧状元及第匾、光绪三十年(1904年)朱汝珍榜眼及第匾、乾隆五十四年(1789年)刘凤浩探花及第匾。状元、榜眼、探花就是殿试的冠军、亚军、季军，这前三名合称三鼎甲。这三个人相距万里，时差百年，能将三鼎甲匾集全实属难能可贵。

洪钧“状元及第”匾，本悬挂于苏州洪钧的“状元府”门楣上，“文革”初期不知去向，等到它再次出现时已是在日本的东京。馆长刘晓轅打听得知后，在当地华侨和留学生的帮助下，出资5万美金抢救回国。该匾高165厘米，宽84厘米，红地金字，四围饰以二龙戏珠、龙凤呈祥等古朴图案，正中上方有“奉旨”两个楷书小字，正中为“状元及第”四个金色大字，上款为“同治七年岁次戊辰科”字样，下款驳蚀。经查证该科状元为大名鼎鼎的清廷驻俄、德、奥、荷四国大臣洪钧。

在排列有致、分门别类的众多藏品中，有块进士匾引来不少学者的热烈讨论与争议。



【行走齐鲁】

## 曲阜有座状元博物馆

□周东升

这是一方明天顺敕颁黎淳榜进士匾，宽71厘米，长171厘米，由上好的松木做成，装饰以明

代特有的披灰工艺，呈现暗枣红色。牌匾正中榜书“进士”两个楷体大字，上款小字题为“太子少保吏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夏寅书”，下款为“大明天顺丁丑科黎淳榜进士方中”。天顺丁丑年即1457年，距今已有整整560年的历史。

这块历经劫难的牌匾是馆主从江西淘得，据说“文革”时期被造反派破“四旧”从黎淳后人家中抄走，眼看就将付之一炬，由于它做工精细，材质优良，而且块大方正，就被生产队长截留下来，当作了仓库的门板，才得以逃过焚毁。但自此也就多出了几个“面向工农”、“伍号”等当地百姓的涂鸦之作。

令人匪夷所思的是，黎淳是该榜状元却敕颁一方“进士”匾。经过考证，原来在明朝初期，殿试结果划分为三个档次，称为“三甲”。其中第一甲为三人，叫“进士及第”，分别

称状元、榜眼、探花；第二甲若干人，叫“赐进士出身”；第三甲若干人，叫“赐同进士出身”。当时朝廷并没有将“状元”作为殿试第一名的专称，因此黎淳得到的也是一块“进士”匾。

也有些专家、学者对此提出异议，认为这是黎淳同榜进士方中的牌匾。产生异议的根据便是牌匾上所题的“大明天顺丁丑科黎淳榜进士方中”下款。黎淳榜进士或某某榜进士，是古代科举考试的科别标签，一般习惯于以该榜的第一名即状元名字来标明科别。既然黎淳为该榜状元，所以标称为“黎淳榜”。

这种歧义并非没有道理。《明清进士题名碑录》记载，黎淳与方中的确为同榜进士。黎淳(1427—1491年)，字太仆，本姓杨，后随姑父姓黎，今湖南省华容县胜峰乡龙秀村人。明英宗天顺元年(1457年)丁丑科状元，授翰林院修撰，官至南京礼部尚书；方中，字大本，浙江省严州府淳安县富山人，系黎淳榜三甲第120名，即总体排名第220名。历任玉山县知县、南官县知县、监察御史、贵州按察副使等职。

一方承载古代学子艰辛与荣耀的进士牌匾，竟能引发这么多人的关注和探究，我国历史上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影响之深远，状元文化内涵之丰富，由此可见一斑。而这，也恰恰是民间博物馆方兴未艾的意义所在。

【往事】

## 64年前，俺过的儿童节

□张庆国

“六月里花儿香，六月里好阳光。六一儿童节，歌儿大家唱……”这是中国少年先锋队第一代队歌。64年前我10岁，当上少年先锋队队员，胸前戴着红领巾，雄赳赳、气昂昂放开喉咙歌唱的，就是这首队歌！俺们唱着它，提着瓦罐抬着水桶，每天早晨给孤寡老人去井台打水；下课后，背着筐拉着小车往地里给残疾人送粪。每年六一儿童节，打着队旗集体上街游行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。

1952年11月上甘岭战役结束后，战败了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部队不惜使用细菌战。我国人民愤怒声讨的同时，大力开展除四害讲卫生的爱国卫生运动。1953年的六一儿童节，我上学的德县曹村区纪家店乡完小全天没有上课。上午，段金龙老师(他是乡联校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书记)带领学生上街游行，少年先锋队的队伍打着队旗，昂首挺胸地高唱：“消灭细菌战，捉拿细菌战犯，全中国全世界的人民，一齐动员，一齐动员。”上午走了纪家店、张牌庄、胡官营、头百户四个村，到了下午一点才回到学校。

午饭后开展除四害讲卫生的爱国卫生运动，全校翻箱倒柜大扫除，昏昏晃晃不留死角。打扫完学校，学生们主动走上学校驻地纪家店村，清扫大街小巷。联校团委要求少年先锋队带头，每个队员两天之内，至少打死200个苍蝇，消灭1只老鼠。6月3日一早来校交纳实物，按战果评出一二三等奖。

立夏之后，正是苍蝇繁殖的季节。那时，有窗纱竹帘的人家少，室内室外苍蝇乱飞，消灭200个苍蝇应该不成问题，实际不然。没有现成的工具，蝇拍自己做，有的剪半截鞋底钉到木棍或竹棍上，有的钉块纸板。鞋底纸板不透气，举起来一股风，还没有落下去，苍蝇惊慌飞走，自然打不死。纸板上钻些洞，好是好，就是纸板爱折。打三五下蝇拍就会坏。队员们为了完成任务中午不休息，去厕所粪坑猪圈牲口棚苍蝇多的地方打，用镊子把死苍蝇捏到纸盒或玻璃瓶里保存好等着过数。

最难消灭的是老鼠，消灭多少的证据是交老鼠尾巴。当时没有药死老鼠的药，逮老鼠的工具是老鼠夹子老鼠笼。支到老鼠洞前，老鼠狡猾，放的诱饵再香，它不一定上当，谁也不敢保证两天之内准能逮着一只。不少人家养着猫，可喵喵一叫老鼠不敢出来。只有同学孙玉萍洋洋得意，因为她的猫每天逮到老鼠扔到她面前报功，她不在家时把老鼠扔到住屋的角落里等着她。年纪超过十八岁的女同学商荣英足智多谋，几个女队员找她讨教，她给大家出了个主意。几个女生分头打听村里的老农，五点多放学，扛着铁锹担着水桶下地，直奔田鼠洞。清理好田鼠拱出来的土，掘几锹找到洞口往里灌水，首战告捷，头一个洞就灌出两只大老鼠。大家兴高采烈，灌田鼠的劲头更高，第二个洞没掘几锹，掏出老鼠藏在里面的十多斤粮食。第三个洞里没有找到大老鼠，掘到五个蜷曲在毛茸茸老鼠毛里的“光腚”。张金洲拿着铁锹欣喜地喊：“一个洞完成了五个人的任务。”

我回到家就往前街张金福四哥家借老鼠笼，四哥跟着我来家，帮我支到粮食囤旁。一宿没有老鼠光顾，我正发愁，四哥提着只死老鼠给我送家来，原来他是在牲口棚里用夹子帮我捉到的。

我那时当少先队大队长，6月3日早晨验收，段老师忙不过来，让我帮他点数。程何庄的吴金才打了351只苍蝇拿到冠军，前小屯的尚淑华参加灌田鼠，交上三根老鼠尾巴。养猫的孙玉萍提着只死老鼠来学校最晚，我见她手上缠着纱布，问她怎么回事？她哭丧着脸告诉大家，她从猫嘴里拽老鼠，平日对她百依百顺的狸花猫突然使性子挠了她一爪子。

六一过后曹村区教委评比，纪家店少先队夺得第二名。

【老照片】

## 兵团农场的拖拉机手 □李强

1970年初，父母所在的机关开始酝酿干部“走五七道路”，即全家被下放农村。父亲深知他既是“走资派”，又是“站错队的人”，与其全家都被安置农村，还不如尽量给孩子找一个稍好的出路，于是便通过原驻机关的军代表田叔叔的关系，将我和大弟弟安置到了济南军区山东生产建设兵团二师九团。

我与弟弟同被分配到三营(齐河县宣章公社)，或许我由于表现较好，不久便被调至后勤连学开拖拉机。这是一个当时令全营人羡慕的工作，每当我开着“东方红”履带式拖拉机轰轰隆隆地驶向大田作业时，总能赢得人们好奇与羡慕的眼光。

拖拉机班的人住在营部里，“三秋”“麦收”之际有时营长直接到班里询问耕作的进度，安排工作，忙完全营活计后有时还要到驻地大队帮助耕田。

拖拉机手工作之艰苦也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。“三秋”大忙时，天黑前就得到地头接班，然后灌满一大箱柴油，在辽阔的大田里耕地、耙地……劳碌一整夜，“歌人不歇马”，只有在子夜时分吃夜班饭时稍稍喘息一会儿。偷闲磨磨自然是甭想，因天刚蒙蒙亮时营长早已站立在地头，你干了多少？质量如何？哪能逃得过他那双“农业专家”的慧眼。记得1971年国庆节之夜，我就是与战友驾驶着“铁牛”在大田里度过的。

此照片摄于1970年底，老班长黄一青(前排右二)将调到淄博工作，笔者(前排左一)与战友们来到麦田里，合影留念。47年过去，当年十七八岁的毛头小伙如今都已年过花甲，然而这段激情似火的青春岁月却将永驻心间。



提起粮票，现在的孩子大都不知所云。但在我小的时候，粮票之于每个家庭都是必不可少的东西——买面、买粮要粮票，去副食品商店买点次要粮票，更不必说出门远行了，必须带足了粮票，否则，拿着钱也买不到食品。

粮票分全国粮票和地方粮票两种，面额则从一两、半斤，到五斤、十斤不等。全国粮票不用说了，自然是全国通用；地方粮票则五花八门，不仅印制的形式花样繁多，面额也各有不同。粮票虽然只是购粮的凭证，本身并不具有价值，且不许在市场上买卖流通。但在我上初中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粮票不仅可以直接交易商品，而且粮票本身也可以私下买卖，甚至每张面额不同的粮票都有不同的明码标价。

我从小喜欢读书，初中时已算是一个资深的爱书人了。当时与我同样喜欢读书藏书的同学，还有一位名叫赵飞的同班同学。因为有着共同的爱好，

【旧时光】

## 全国粮票

□王淼

我和他自然非常要好，我们一起泡书店，交换各自的课外书，语文成绩也差不多，在班级内都是遥遥领先，只是理科学得一塌糊涂，也就是一般老师形容偏科学生时所说的“瘸腿”吧。

那时候买书，最让我们作难的，首先是没钱。我的父母和赵飞的父母工资都不高，他们养家尚且捉襟见肘，偶尔给些零花钱，当然远远不能满足

我们对书的占有欲。而谎称“学校要收什么费”，一次两次还管用，用得多了，也总有露馅的时候。所以，书店不进新书，我们常常盼着，一旦书店进来新书，又会陷入无钱购买的尴尬境地。情急之下，不免东挪西凑，只要一书到手，也就顾不得许多了。但即便如此，仍然还是会与许许多多喜欢的书籍失之交臂。

应该是1979年冬天吧，我们盼望很久的一套书——巍巍的《东方》终于在小城的新华书店上架了。一套三册，当时的定价只有两块三毛钱。但是，两块三毛钱对于我和赵飞，却已经是一个不菲的数目了，我们分头筹措，最终所获寥寥。正当我感到一筹莫展之际，赵飞突然跑过来告诉我：“别愁了，我家有全国粮票。”“全国粮票能当钱用？”我还是半信半疑。“你就别管了，看我的。”赵飞很自信地说道。

原来，赵飞此前不仅已经侦察好家中放置粮票的地方，

甚至连销售的渠道也打探得一清二楚。那是一张面额五斤的全国粮票，据赵飞说，可以卖到两元钱，而余下的三毛自然好办。傍晚时分，我和赵飞小心翼翼带着粮票，来到一个偏僻的十字路口，站在昏黄的路灯下守候。果然，不大一会儿，便有一个中年男人过来和我们搭讪。他带我们走到暗影处，并用手电筒仔细审视了我们所带的粮票。经过一番简短的讨价还价之后，这张面额五斤的全国粮票最终以一元八角的价格出手。回忆彼时情境，与我经常在电影上看到地下工作者之间接头的情节约略仿佛。

但不管怎样，《东方》终于到手了。我不知道赵飞是否因此受到父母的责骂，但那套《东方》却着实让我们兴奋了一阵子。有了这次经历，后来在外地上学，我还如法炮制，偷偷卖掉了家中所藏的国库券，从而获得一套装帧精美的《全宋词》。